

“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 ——纪念向达教授诞辰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小结

荣新江

一、会议缘起

这次会议本来是个很小的计划，因为最近若干年来，段晴老师和我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部的专家一起，陆续帮助国图购买了几批各种语言文字的和田出土文书，其中以于阗文为主，也有不少汉文文书和梵文写本，还有一些佉卢文、藏文文书等。去年上半年，我们与国图善本部同仁讨论，开始从北大东方学研究院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两个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申报教育部重大研究项目，段老师负责胡语，我和林世田先生负责汉语文书，分别与国图善本部的科研人员合作，进行和田出土文书研究，因为这批文书中的汉文文书较少，所以我和林世田先生负责的部分也包括国家图书馆未刊和新刊的一些敦煌文献。在讨论项目设计的时候，计划在一年后召开一次小型的研讨会，作为一个中期成果。

此后不久，沙知先生几次找我，建议第二年召开纪念向达先生诞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我们觉得向先生主要的工作单位一是国图（北平图书馆），一是北大，我们一起合作来开个研讨会，纪念向达先生，推进学术研究，是非常合适的事。在开始考虑筹备会议的时候，我们感到这个会议离不开敦煌研究院，虽然向达先生没有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但敦煌莫高窟的收归国有、艺术研究所的成立，都和向先生息息相关。这个提议立刻得到樊锦诗院长的大力支持，所以很快形成了由林世田、张先堂、孟彦弘（沙先生的代表）和我为主的筹备组，会议的规模随之扩大，会议的主旨也就更多地倾向于纪念向达先生的学术遗产。

二、向达先生的学术遗产

向达先生原本做中外关系史，到北平图书馆以后，学术规模扩大，20 世纪 30 年代发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唐代俗讲考》，而且我们今天从徐俊先生的文章中又知道，他还计划翻译一套《西北考古译丛》。记得在 80 年代初，谢方先生曾拿来向先生的一部译稿咨询张广达先生是否值得出版，这是题作“勒柯克高昌考古记”的复印件，说明向先生当年是做出了许多成果，但这个稿子里面确实有很多专名空着没译，而且用的是文言文，所以最后没有整理出版。由此我们看到，30 年代向先生的学术贡献和雄心都很宏阔，在中外关系和敦煌学方面都已有十分丰厚的贡献。以后作为北平图书馆的交换馆员到英国图书馆，调查敦煌文献，但受阻于翟林奈，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学问未得发挥，转而抄录明清中外关系史料和太平天国史料。我们知道，解放后金毓黻主持编辑的《太平天国史料》，其中许多重要的材料就是向先生在伦敦抄录的，所以他在这方面也有很大贡献。向先生这一代学者的训练都很好，所以他并没有因为看不到敦煌文献而没有取得自己的学术成果。向先生回国后，在 40 年代艰苦的条件下，两次到敦煌考察，走出考古、文献相结合的敦煌学正路。我们从收入《向达先生敦煌遗墨》的《敦煌杂录》中，可以看到他在敦煌过冬的情形，因为没有拿到考察经费，他只好借助一件破旧的羊皮大袄过冬，在抄敦煌卷子时，墨经常冻住，可见他是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熬过来的。我们知道，王重民先生和向达先生是那个时代中国敦煌学的

两位领军人物，但王先生基本是文献学，向先生由于没能在文献方面得到发挥，转而去敦煌调查，反而走出了一条更为宽广的敦煌学的道路。在他此次考察以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对于敦煌石窟艺术东西方影响的研究，也是具有敦煌学方法论意义的论述，特别是《莫高榆林二窟杂考》，可以说是一篇敦煌学的纲领性文章。樊锦诗院长在本次会议的主旨发言中，对此有透彻的阐述。樊院长的发言，既是对此前敦煌学的一个总结，更重要的是借总结向达先生的学术贡献，结合樊院长自己多年在敦煌实地研究的经验，指明了敦煌学今后的发展方向。感谢樊院长的这篇主旨发言，对本次研讨会的学术含量推进了一大步。

三、追思向达

本次会议由于何兆武、金维诺、邓锐龄、沙知、宁可、蔡美彪、白化文、程毅中、萧良琼、周清澍、郑克晟、何龄修、徐自强、贺龄华、陈智超、郝斌、诸天寅等老一代学者的参加而提高了档次，在主持人柴剑虹先生的引导下，他们的发言让我们领略了向达先生的治学风采、行事风格，也道出许多学界罕知的掌故。比如关于陈寅恪，有的先生告诉我们，五六十年代真正自费去看陈先生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吴宓，一是向达。吴宓的日记保留下来，但向先生的记录没能得到保留。通过这些老先生的回忆，使我们得知这些珍贵的史实，也让我们了解到在那样艰难的生活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向先生他们仍然做出了那么多坚实的成果。在正式提交的会议论文中，我们又得到很多有关向达先生学术事迹的补充，如徐俊先生谈到的中华书局保存的向先生 30 年代书信的内容，罗丰先生和胡素馨教授根据中研院史语所的档案挖掘出来的关于西北科学考察的一些细节内容，徐文堪、冯锦荣、吴芳思诸位先生关于他在南京、伦敦和北平时期的一些事迹，都披露了很珍贵的材料。

四、会议的学术成果

本次会议在敦煌学方面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粗略归纳，有这样几个方面：

1. 一些文章是直接接续向达先生的学术成就而发扬光大的，如殷光明先生关于敦煌墓葬考古的文章，对敦煌考古有推进作用。可以预期，敦煌考古实际上将是一个相当有前景的方面。另外，黄正建先生关于向先生所录《逆刺占》，刘屹关于通过向先生录文而保留的道教佚经写本，王素关于向达先生所摄《诗经注》的研究等等，都是直接站在向先生的学术肩膀上，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2. 一些学者在向达先生开拓的考古艺术与历史文献结合的道路上继续深入研究。我们主办方面其实并没有特别要求大家提交哪方面的文章，但许多学者大概还是考虑到这一点。如郑阿财先生、朱凤玉老师在佛教文献和通俗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利用了图像的材料，郑炳林先生讨论的文本本身就是图文并茂的材料，而罗世平先生、刘永增先生、张先堂先生都是以图像为主和文献为辅，对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新贡献。朱丽双博士和我的文章则是有意识地力图发挥向达先生倡导的研究方法，用图文互证的手法来考察于阗八大守护神。

3. 向达先生的很多敦煌学研究论著都明显地带有东西文化交流的色彩，我们的研讨会在这方面也有所发扬光大。如吴丽娱先生本来是做纯粹的中国礼制，这次则是谈胡人披发风俗，我想大概是因为她考虑到向先生探讨过长安胡化问题的缘故吧。张元林先生的文章把敦煌的日天、月天和西域、波斯联系起来，因为 1949 年以后大陆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不敢提

敦煌的外来影响。一些论著在谈到敦煌石窟艺术的渊源时，更多地是强调东面的影响，即中原的影响，如凉州的影响、云冈和龙门石窟的影响、道教因素的进入等等。这些方面绝对是正确的，但是忽略了《莫高榆林二窟杂考》所讲的西域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樊院长的主旨发言也是在这方面多用了篇幅。西域的影响过去都交给日本学者去研究了，但是日本学者强调的这条从巴米扬到库车到敦煌的路是不是正确呢？我个人觉得，要考虑丝路南道的影响，比如于阗和米兰，这些地方和敦煌那么近，难道没有关系吗？至少从我们这次提交会议的八大守护神来看，我觉得这些方面是非常值得继续探讨的。另外，沙武田先生谈粟特人的开窟造像的问题，我想也是受近年来探讨粟特热潮的影响，所以重新去看这样的问题。结论不是最重要的，但方法论十分重要。再如余欣谈宝物的东西交流等，都是从东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讨论对敦煌的影响。我想这方面将来当有更多的进步。

4. 向达先生敦煌学研究的继承与开拓。这些方面较广，张德芳先生用汉简大大推进了我们关于汉代敦煌的知识，一下子排出这么多敦煌太守，将来贴进去事迹，汉代的敦煌历史就出来了。段晴老师、刘文锁先生、陈怀宇关于于阗文献的研究和比证，代表了敦煌学的扩展。段老师的文章给我们非常新的感觉，语言学能做到这么细，一撇一勾能看出它们的差异，这是过去我们国内的敦煌学没有的东西，这些方面代表着敦煌学的拓展，而且不仅是对中国敦煌学的拓展，更是对世界敦煌学的拓展。这方面也包括刘文锁先生有关于于阗文占卜文献的研究，我想这篇文章其实是利用了秦汉日书研究和近年来敦煌汉文文献中的占卜文书的研究成果。于阗文、佉卢文和吐火罗文文书里面选择、禄命类的占卜文书表现的是中国传统的思想，西方的伊朗学家和语言学家并不了解。这方面将来当有很大的天地，所以说这不仅将是敦煌学的进步，也是世界敦煌学的进步。再如林世田、刘波两位先生对和田出土的汉文疑伪经的研究，这是我们课题组成员的一项研究成果。这篇伪经是当地写的文献，所以非常有意思。李际宁先生关于小字本《法华经》的年代判读，可以作为定论，这是对向先生印刷史研究的推进。孟宪实先生从社文书的研究上，推进到今天学界关注的“书写”问题上。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关于书籍史的重要篇章。向先生那个时代的书籍史，主要还是版本目录学，今天的书籍史已经进入社会层面。此外，如杨秀清先生关于儿童图像，可以归入儿童史研究。姚崇新、雷闻的文章是我们此前进行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的延展。孟嗣徽女士则把敦煌壁画研究延续到对山西壁画的考察，颇有分量。还有赵和平先生关于写经中的重要人物惠立的文章，他说写这个题目是因为学生要纪念老师，所以选慧立和玄奘的事迹，有一点纪念的意义在里面。其实这里面还有一层意义是，《玄奘传》第一次译成汉语之外的文字是回鹘文。他这篇文章的题目虽小，但对于我们经常研究长安的人来说，所探讨的可是件大事，如其中谈到的武则天家族和长安寺院的布局等。敦煌文献的内容的确非常丰富，其中有相当多的文献其实并不是敦煌文献，而是长安文献。我们的长安读书班也在读敦煌文献，是读里面长安的内涵。萨仁高娃老师这次关于《圣教序》的文章，在我看来也是属于这样的长安文献。其实扩大到谢继胜先生的八塔变、沈卫荣先生关于拉达克发现的与敦煌禅籍有关的藏文经典，都跟更广阔的敦煌学术研究有关。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来得及请日本学者与会。所以杨富学先生在沙州回鹘的问题上激烈地回应了森安孝夫先生的看法，可惜没有对话。所以我们希望赶快把他的文章发表出来，来看看森安先生的反映。总之，这些文章是对相关敦煌学研究课题的推进。比如沈卫荣先生关于《禅定目炬》的研究已经做了很多年，这些东西

藏学界是一直关注着，内容非常重要。这些在拉达克列城的寺院里面发现的东西，内容与敦煌藏文禅宗文献一致，而且比敦煌的更完整，只不过抄本很难读，做起来不易。我过去虽有耳闻，但这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详细的说明。在敦煌学史方面，除了向先生的事迹外，朱玉麒、史睿补充了两个为人忽略的重要人物，王树楠和董康，他们其实是敦煌学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

今年有好几场敦煌学术研讨会，三月在杭州，八月在敦煌，我们在中间，感谢大家的支持，在这么频繁的学术研讨会的中间，贡献了超出我们预想的成果，使得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

最后，我代表筹备组感谢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北大历史系三个单位的支持和帮助，感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的大力赞助。感谢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工作人员，感谢北大历史系的研究生的劳动。

（朱丽双根据发言录音整理并经作者校对）

（载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605-608页。）